

汉语客器

尤佑◎著

一半是江水

一半是山树

江上有远帆

山洞藏楼阁

我在前半生

只看江水

我在后半生

欣看楼阁

任何时候

我都不是完整的自己

总是

一半一半又一半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汉语客语

尤佑◎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杭州

献给竹琴、屿瓷、楠歆。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

——《老子·第 22 章》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曹丕《善哉行》

目 录

诗学篇

- 从转型期到新时代:当代汉诗再出发 003
- 重估中国湖畔诗社的文学价值及后世影响 008
- 当代女性诗歌创作的“没影点”
——评《第二届 2016—2017 华语女子
诗歌大展作品选集》 028
- 于汉语纵深处的马
——论汗漫的诗歌创作 036
- 远观近看,诗还是幸福的样子
——论许春夏的诗歌近作 048
- 异域经验,或待完成的测绘诗学
——论蔡天新的“域外诗丛” 054
- 省净的中年诗,或时间平衡术
——评张敏华诗集《风也会融化》 064
- 现实主义创作之一种:“所有的美都在窗外”
——康涇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路径解读 078
- 代际与反叛:阿斐,80后诗人的标杆 086
- 诗在语言的迷宫内自由生长
——读赵俊的诗兼诗歌现代性思辨 095

- 及物成思后的永恒静默
——福建青年诗人吴友财诗歌创作小论 103
- 却道王谢堂前燕,亦留寻常百姓家
——略论蓝帆的诗歌近作 108

读评篇

- 用文字呈现一个立体的西藏
——读《西藏文学》创刊40周年作品
回顾展专刊 121
- 形似的真实,在汉语的尽头
——评刘震云新作《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125
- 雅言与轻信
——评文珍小说集《柒》 130
- 你究竟为谁而活
——评但及中篇小说《玛瑙》 135
- 秀水多才女
——杂谈嘉兴女作家群 139
- 床乃万象聚集处
——评崔秀哲的长篇小说《床》 143
- 80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
——简评张柠的长篇小说《三城记》 149
- 瞧,那些飞起来的大师
——读邱华栋的随笔集《作家中的作家》 152
- 西方诗歌的现代经验
——读沈苇诗学随笔集《正午的诗神》 155
- 打开窗,看当代中国的民谣莲花
——读梦醒随笔集《一尘半梦》 158

仿冯唐说	
——《不三》读后记	161
尘埃的痛感	
——简评凡人系列《守门人》《卖菜老人》	163
透明的静默	
——简评丁威组诗《往事并不吹过远山》	165
“一把油纸伞收拢了全部流年的芬芳”	
——简述李鹤影的新诗古韵	167
“回头向诗”，故乡仍是春天	
——评江文波组诗《感恩春天》及其他	169
天人合一，物我两忘	
——简评田文凤组诗《第三个时辰》	172
草木心与人间情	
——简评聂凤森组诗《大雪之河》	174
在江南，表妹遂想起	
——简评水子组诗《烟雨长廊》	176
虚实相生与春天抒怀	
——简评吴其同组诗《我和春天》	178
多谈主义(后记)	180

从传统期刊到新时代，当代中国诗坛的流变

诗
学
篇

从转型期到新时代：当代汉诗再出发

21 世纪初期的诗歌延续了宋诗“文字为诗、才学为诗、议论为诗”的传统，开启“诗证时代”。但对于社会精细分工背后的多元诗歌，也存有泛滥、晦涩的非议。现代人对诗歌的审视，与庞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分不开。资本裹挟、数据引领、市民日常令诗歌之路日益逼仄，以致有人笑谈“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

当时，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打工诗歌及中产阶级诗歌创作蓬勃发展，异乡情愫在诗歌中日益彰显，当代汉诗因此而释放出新的活力。大体观察，可归纳为“学院派诗写”“口语诗诗写”“多元综合诗写”三类。学院派的诗歌创作占据了中产阶级创作的主体位置，他们主张语面的陌生、意象的重叠、哲理的深邃等，以词语“繁殖”的形式写诗，层层推进、想象再生，丰富了汉语表达的可能。与之相对的是碎片化诗写带来了口语诗变革。针对较为固化的汉语表达，口语诗创作者主张生活化、平民性、碎片化，但因为“过于段子”而产生了“时兴”大于“诗性”的结果。好在，多元的民间写作及知识分子诗歌创作，让新时代诗歌有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无疑，当下中国所处的新时代，对诗歌创作提出了新要求，也给诗学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借此东风，当代汉诗再出发，应侧重诗歌语言艺术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着力梳理、规范、包容、丰富汉诗的表达，力求做到“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让当代汉诗回归日常抒情，真正恢复汉语的光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地域文化格局巨变。站在时代的节

点,回顾转型期的诗歌,有两点值得关注。

其一,资本化、网络化对当代汉诗的影响。诗歌的资本化问题不同于网络文学创造的产值,而是资本化运作对人民生活的全方位影响。21 世纪之初,我国稳步进入大资本化以及后工业时代。同时,网络呈蔓延式发展。人处在大数据的怪圈之中。互联网终端、移动终端占据了人的大部分时间。信息社会的捆绑带来阅读和写作的碎片化,一方面打开了诗歌创作的民众之路,另一方面又让汉诗写作陷入泛滥态势。近 20 年,诗歌写作经历了论坛热潮、博客发表,到眼下的朋友圈晒诗,诗歌几度繁荣,又极度虚空。纸质诗歌刊物的订阅量日趋减少,而网络诗歌则泛滥成灾、难出精品。这反映了深度阅读的缺失。从诗歌活动上看,为体现文化的繁荣,诗歌活动盛极一时,各地以诗歌之名,大兴诗歌集会。资本与网络对诗歌有本质的腐蚀作用,让留在表面的当代汉诗成为“低门槛”“无标准”“无底线”的茶靡虚伪之作。尚未成熟的诗人极易受到名利诱惑,而未历困境打磨、缺少充分的时间创作,更缺少生命主体意识。本来,人是有人权的,但有些人在资本与网络的裹挟下,主体被异化了。而后,资本化之后的人更趋向于盲从资本,追求金钱,追求利益,追求社会身份,失去了理想主义和人文关怀。

其二,中国人步入了市民生活和市井社会。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的加快,原来的聚居式氏族生活变成市民生活、城乡接合部的市井生活,人们更多地倾向消费主义,对整个民族、整个国家、整个人类的走向,缺少心灵观照。在这里面,大多数人都活成了小我。诗人的写作亦是小我写作,呈现的是语言的狂欢、语言的消费。诗人开始寻找属于自己的“舒适带”,因为那是诗人最舒服的表达方式。一旦出现承担集体的情况,诗人的“气格”就显得很低。好在日常安逸,无须诗人去承担,而诗人也热衷于对美学修辞,对小句子的精致追求。很多学院派不再具有理想主义,而是进行某种语言衍生游戏罢了,而一些所谓的口语诗,打着民间的旗帜,只体现了小我在社会及压力下的疼痛感,表达机械、千篇一面。诸如此类,限于个体经验的表达,难以承担民族与时代之大义,也难以抵达真正的艺术之境。

文随代变,诗为引领。当代中国所处的生活境况以及社会分工,决定了

人们关心的是“自我本身”。所以诗歌创作者不经意就落入表达自我的怪圈。市民社会的现况,源于消费主义,更是社会资本化的必然结果。面对日益繁复的现实境况,诗歌创作难以驾驭时代,又何谈引领未来呢?诗人转入个人化的叙事(注意:这不是真正的生命叙事)。即使诗人抒发自己个人感受再多(这是资本与网络覆盖下的虚拟镜像),但放到时代背景之中,诗人只是被异化的数据符号而已,极易成为网络信息的傀儡。在后工业时期,资本控制一切,数据引导一切并解释一切,我们每一个人,其身份,比如说是职员身份、公司领导身份、官员身份,其实都是资本里的符号,或者是资本理财中的零部件,构成整体国家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如此符号,如此指代,如此虚无的个体存在,决定了泛滥的网络诗,等于无诗,等于没有突出体现出 21 世纪中国转型期的汉诗。

当然,在虚无高蹈之表象下,转型期诗歌定有暗流涌动。譬如,始于世纪之初的打工诗歌,郑小琼、许立志等诗人,较好地把后工业时代的隐痛与个体生命交织阐明;以陈先发、胡弦、李元胜为代表的优秀诗人,他们的诗歌创作富有中国古典文化的抒情特色,延续了汉诗的纯正血统,呈现了汉诗高贵的精神向度;亦有把中国古典诗词空灵性表达与西方现代诗歌深度意象融合的诗人,他们的创作之风有中西合璧之感。我更愿意看到的是:当代诗人写当代汉诗。进一步讲就是,当代汉诗一定要融合现代社会的语言元素、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现代人所渴慕和追求的精神写意。

十九大召开以来,文艺工作得到极大重视。如何让诗歌进入大众生活?或许,当代汉诗再出发时,可以注重汉诗的生活基础和民族意识,充分体现当代汉诗的当代性、生长性、人民性、民族性。对于诗歌来说,经过转型期的资本裹挟问题,诗人耽于语言狂欢的问题仍在影响着当代汉诗的发展。如何解决过于雕饰、炫技的诗歌创作等问题,让当代汉诗回归人民视野,既需要遵循艺术创作的规律,又需要将人民放在创作的中心位置。

正所谓“蓄道德而能文章”,作为新时代的诗歌创作者,必须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充分掌握汉语文化的话语权,不能做西方文艺理论学的奴才,更不应使中国古典文化和汉语本身的光辉淹没。

一百年前,湖畔诗社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个新诗社团成立,本质上就是平民主义的胜利。而今中国文艺又到了革除晦涩、走向平易的关键端口。新湖畔诗社将继续推进“诗的日常抒情”和“汉语本身的魅力”两项革新。

首先,诗歌的日常精神,在长久以来为诗人所关注,但是并非被提到一个旗帜性的地位。《新湖畔诗选》以“开自由之风,向自然致敬”为目标,显示出诗性诚意,其“自由”“自然”正与转型期的“资本裹挟”“数据引领”相生相克。倘若人类要做到真正的诗意栖息,必须要回归个体的日常生活,远离资本运作,向自然靠近。湖山所据之地,正是人类心灵的秘境,仿佛诗歌。作为心灵的产物,其文化价值在于抚慰心灵,引领人民求真、向美、务实、向善、积极创造力量。如果诗歌仅仅是少数人斗智的载体,那么诗歌仅是玩物罢了。新湖畔所提倡的诗歌文本,应该是晓畅平易之中富有曲折变化。我们反对过于晦涩的诗歌,也反对过分“口水”的诗歌,不管是叙事描写,还是议论抒情,“诗言志”的传统应该加以巩固。只不过,在当下百姓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所需的背景下,汉诗不应该停留在空洞抒情,也不应该只是凌空蹈虚的议论,而应该注重观察日常,用流畅自然、平易婉转的语言,写出当下生活的日常诗意。

其次,诗歌本身就应该反映时代生活。本着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艺理论,诗歌创作应该扎根于人民。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从祖国大好河山中发现自然之美与人文之厚。由许春夏、卢山主编的《新湖畔诗选》,作为浙江诗坛的新兴力量,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明亮的文学主张。如今诗选已完成了三期的征稿,前两本诗选的出版,完成了较为扎实的理论架构,同时,也得到了全国各地诗人的支持,尤其是80后、90后诗人的倾力相助,具有良好的诗写基础。

以人民为中心的诗歌创作,是注重个体意识及尊严的写作。必须克服士大夫写作的浮靡之风,也不同于格律诗新韵,我们认为自然和自由是当代汉诗的价值取向,不应受到过多的禁锢。力求在接近自然、晓畅通达中富于曲折变化、理趣引领,让诗歌真正成为人民的艺术,成为语言艺术的精品。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底蕴深厚,且从未间断。诗文,尤以“天人合一”为最高追求。可以断言,中华文化自成高格,其气度和底蕴构成民族性基础。

新时代的文艺视阈,一定是国际化的。国际化的同时,需要固守民族文化之根,在此基础上,与各国文明参照比对,分析孰优孰劣,从而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价值观。

作为诗歌创作,必须坚持恢复汉语光辉的创作导向。汉诗,一度翻译腔过浓。毫无疑问,对西方诗歌的译介,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当代汉诗的现代性基础。但是汉语有汉语的特点,比如:精准且丰富,多义又形象,鲜活并典雅,具象而风韵。将汉语的特性融入诗歌创作,是体现汉诗民族性的关键。

中国是诗的国度。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所反映的诗歌与政治的态度,它所运用的表达技巧,它所蕴含的中国诗歌的气格,正是当代汉诗所欠缺的。风雅颂,赋比兴,这样传统文化的精粹;山水田园,送友酬酢,如此诗意的生活日常;朴直晓畅,曲折变化,如此丰富的汉语表达:皆可称为当代汉诗的养分。

于此,我不是主张复古,恰恰是想要明确当代汉诗真正的现代性。我一直认为,诗歌的现代性正是它的生长性。所谓的先锋诗歌,只存在于概念之中,而现代性生长则反映了生活、语言与诗歌的密切关系。

只有诗人时刻在场,根据当下的语境进行鲜活的创造,他的诗歌才会具备现代性。相反,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诗歌历史当中,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则会丑态百出,完全写不出符合当前语境的现代诗。所以,新时代诗歌的民族性,要求当下诗人用鲜活饱满的汉语写出在场的当代汉诗。

——《新湖畔诗选》第3期

重估中国湖畔诗社的文学价值及后世影响

一、越过《冬夜》：“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诞生

风起云涌的 1921 年，其意义是全方位的。对诗歌来说，郭沫若的《女神》横空出世，为 20 世纪的文学高潮之一。诗人创造的“凤凰涅槃”意象，高度概括了黑暗中国的重生愿景。当然，新诗的尝试并不“为我独尊”。自胡适强调“诗体大解放”后，刘半农、沈尹默、鲁迅、周作人、康白情、郑振铎、汪敬熙、朱自清、郭沫若、玄庐、刘大白、俞平伯等人都尝试过深浅不一的探索。其中，俞平伯已有属于自己的诗学建构。他的诗集《冬夜》（1922 年亚东图书馆）遭到很多人的反对，譬如，闻一多曾专门写作《〈冬夜〉评论》，对俞平伯的诗歌创作提出了褒少贬多的批评意见，认为《冬夜》虽然音节“凝练、绵密、婉细”，但总体缺乏想象，意境亏损，单调寡味。可以说，闻一多从中国古典写意出发，不满足于思想和语言的生活化，故俞平伯等人的新诗，有过于粗浅的毛病。他曾经说：“我本想将当代诗坛中已出集的诸作家都加以精审地批评，但以时间的关系只能成此一章。先评《冬夜》虽是偶然检定，但以《冬夜》代表现时的作风，也不算冤枉它。评的是《冬夜》，实亦可三隅反。”依此言，如果闻一多不被暗杀，现代汉诗的“古典”继承定会更好。不可否认，在五卅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之后，新诗的发展的确外倾严重。闻一多对俞平伯的“诗的进化的还原论”“民众文学”“贵族化和平民的论争”等诗学讨论持否

定态度，皆因他们的创作主张不一。闻一多研究中国古典文化，创作《唐诗杂论》等，旨在为“衰微的民族开一剂文化药方”，而俞平伯则想用平民的思想去解决新汉诗的语言问题。

除俞平伯外，主张平民白话的大有人在。但同样也有梁实秋等人，认为胡适的《尝试集》矫枉过正，且认为“自白话入诗以来，诗人大半走错了路，只顾白话之为白话，遂忘了诗之以为诗，收入了白话，放走了诗魂”。即使这样的论争已经过去百年，我们依然可以从中找到某些关于汉诗的终极争端问题：诗为谁而作，汉诗究竟如何运用汉语，等等。

如此文化背景下，1921年1月4日，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郭绍虞、朱希祖、瞿世瑛、蒋百里、孙伏园、耿济之、王统照、叶绍钧、许地山等十二人在北京成立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的文学研究会。作为响应，1921年6月上旬，留学日本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于日本东京成立创造社。

1922年5月上旬，一本叫作《湖畔》的诗集在上海出版了。这是一个月前刚刚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新诗社团湖畔诗社的第一枚硕果。集中收有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的诗作和从汪静之《蕙的风》中选出的6首小诗。初版3000册一问世，立刻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写信致贺。到了1922年9月，汪静之《蕙的风》出版，由朱自清、胡适、刘延陵作序，周作人题写书名，短期内就印了5次，销售2万余本。1923年12月，湖畔诗社又出版了《春的歌集》，收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三人诗作105首和冯雪峰怀念潘漠华的文章《秋夜怀若迦》。湖畔诗社的影响日益扩大，1925年3月又出版了谢旦如的《苜蓿花》，另外还创办了文学月刊《支那二月》。

诗歌是时代的先兆。《湖畔》的创作风向，一定程度反映了当时青年人的思想动态。浙江作为文学重地，引领全国的精神风尚。当时就读于“浙江第一师范学校”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经由在上海工作的应修人的联合与商榷，正式在浙江西湖畔成立了中国湖畔诗社。他们的创作比《尝试集》中的诗歌要成熟得多，既剔除了《女神》的高亢，也突破了俞平伯《冬夜》的寡

味,一定程度上汲取了英国“湖畔诗派”的抒情养分,滋生了中国本土的“第一个新诗社团”。

二、抒情传统:自然与人的感受力的互动

中国是诗的国度,汉诗的精神不断传承,历久弥新。这印证了席勒关于诗的精神的论述:“诗的精神是不朽的,它也不会从人性之中消失。除非人性本身消失了,或者作为人的能力消失了,诗的精神才会消失。”湖畔诗社的诞生,是江南湖山与新文化背景下的民众感受力相融的结果。

起初,汪静之名气很大,个人诗集《蕙的风》经过多位名家的推荐以及胡梦华的反面论争后,人气鼎沸。因了这“名声”,应修人约于1922年初与汪静之联系,结为诗友。1922年3月底,应修人到杭州西湖畔游玩,并组稿编成一集,即为《湖畔》的真身。从《湖畔》的选诗来看,四位青年诗人创作于1921年到1922年间的诗,诗风有所不同。随后,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他们的诗歌热情被点燃,诗风互相影响,诗艺日渐娴熟。1922年四月初,应修人写了一首赠诗,题为《心爱的》:“逛心爱的湖山,定要带着心爱的诗集的。//柳丝娇舞时我想读静之底诗了;/晴风乱飙时我想读雪峰底诗了;/花片纷飞时我想读漠华底诗了。//漠华的使我苦笑;/雪峰的使我心笑;/静之的使我微笑。//我不忍不读静之底诗;/我不能不读雪峰底诗;/我不敢不读漠华底诗。//有心爱的诗集,终要读在心爱的湖山的。”“心爱的湖山”即为杭州西湖畔美景,“心爱的诗集”则是“湖畔诗人”纯真友谊的结晶。他们以诗之名,同聚杭城,初心可表,情真意切。其朴拙的语言源自情感的自然诉说。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自然与人若即若离。城居者过着忙碌的生活,想象力和社会性会驱使人暂时离开自然,但是心向自然的道路和道德的冲动将人拉回自然。诗的力量正同这种冲动有着密切关联。因此,当自然视野关闭之时,诗的能力并不会丧失,它只是在另一个方向下发生作用。故此,诗与自然,血脉相连。

热血青年,浸润于美丽的湖山,怎能不诗兴大发呢?正如1800年,英国